

基于居民体验视角的新农村合村并居建设模式研究

李堂军,杨璐欣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基于熵值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山东省2008—2018年相关数据为样本,从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四个维度入手,界定了13个影响新农村合村并居建设发展的指标,以此探索居民体验与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及村落空间形态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地区合村并居建设发展模式评估模型,并计算该地区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四个方面权重占比及分配各不相同,而且聚居型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地区,说明在实施合村并居的过程中要杜绝“一刀切”“齐步走”现象。因此,根据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和Moran's I系数的不同,本文将合村并居建设模式划分为零社区发展、旧村升级分散发展、乡村聚居大社区发展三种大模式;同时考虑各地区在经济、人口、公共服务和生态方面的发展差异,进一步地划分为乡村经济主导发展、人才吸引保持发展、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发展、现代乡村健康环保发展四种小模式,为我国新农村合村并居建设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发展优化策略。

关键词:居民体验;合村并居;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农民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2)03-0078-10

一、引言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是乡村社会组织,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搭配先进的精耕细作技术就形成了自给自足且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共同体。^[1]这种稳定的乡村家族结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实行而逐渐瓦解,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也不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农村青年劳动力纷纷放弃传统的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谋生手段大批涌入城市,造成城镇用地紧张,同时大量“空心村”的出现使得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84 84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0%;根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 199万人,占总人口的63.89%。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城镇化建设的日益完善,使得当前政府工作的焦点开始逐步转移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上来。

合村并居,又称合村并镇、合村并城,是传统乡村村落向现代城镇发展过程中居住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转变,^[2]是国家力量主导下的行政村在治理结构、资源配置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逐步一体化的合并,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适度规模经营^[3]。乡村合并不是简单的乡村集合,而是乡村形态、村民融合、资源整合、生产经营、治理机制等的全面升级,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巨大转型,^[4]⁶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精简政府机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山东省的莒南县、诸城市、平原县、昌乐县、临朐县以及重庆、

收稿日期:2021-04-28

作者简介:李堂军(1965—),男,山东临朐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天津、浙江、江苏、湖北、黑龙江等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村庄合并工作。

但是,伴随着合村并居建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村民却对其推行过程中的某些措施感到不满。很多地区在推行合村并居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地域差别,盲目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一刀切”“齐步走”现象尤为严重。除此之外,某些地区完全不考虑村民房屋拆迁之后的住房安置和生产生活问题,忽视村民感受、不尊重村民的意见,更有甚者强迫村民“自愿同意”合村并居。如2020年5月,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希望通过规划手段推进合村并居工作,但该政策遭到滨州惠民县人民的激烈抵制,并且由于群众反对拆迁意见较大而激发群体性事件,2020年6月山东省政府叫停了“一刀切”,并承认工作中的不足。^[5]因此,本文从居民体验视角入手,关注不同地区是否具备进行合村并居建设的条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合村并居发展模式,以期稳步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步伐,尽量避免“一刀切”“齐步走”现象的出现。

二、相关研究

党国英^[6]指出,村庄合并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单纯行政兼并,让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农户并不搬迁;二是在行政合并的同时,让农民集中居住,形成比较大的居民点。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合村并居建设中,主要采取第二种方式。尹雷、王思贤^[7]以山东省莒南县相沟乡三义口社区的“大村庄制”农村社区建设历程为例,三义口社区的“大村庄制”建设自2004年启动,原有的沟东村、王三义村、东三义村、张大路村、杨家三义村、张家三义村六个行政村的基层党支部被取消,建立新的三义口社区党支部,通过“四不变”与“四统一”举措顺利完成了从“多村庄”到“大村庄”的转变,整合集体土地资产,解决原有村债务,对新的村庄统筹规划,实现当地的工业化、城镇化,达到“多村庄”自治管理与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双重统一。武中哲^[2]在研究山东省诸城市合村并居建设中指出,诸城市采取了宏观一致与微观差异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各个村庄富裕程度、产业状况、地理位置、自然村之间联系的不同,分别依靠市场和行政力量进行两种路径的村庄整合建设,典型案例有杨春社区是依据市场机制整合而成,而土墙社区则是在政府财政支持下实现村庄合并。刘富刚、刘连兴^[8]指出,德州市的合村并居试点工程开始于2008年,在充分考虑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地资源、人口密度等因素下,开创的农村居民点改造模式有公寓化社区模式、村内改造社区模式、搬迁新建社区模式、合村并建社区模式。张秀吉^[9]在对山东省齐河县实际调研过程中指出,为解决全县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带来的“三高两难”等问题,齐河县积极探索出了城中村改造模式、区中村改造模式、村企联建模式、小城镇吸纳模式、偏远村整体迁并模式等六种村庄合并社区建设的模式。

除山东省外,其他省份的合村并居建设也颇具成效。陆昇^{[4][6]}指出,兰溪市于2015年在浙江省率先开展行政村合并工作,在村庄合并实践中,注重整合优化行政资源,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推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完善公共基础、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李春风^[10]结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林县丰林村实情,指出丰林村通过全民公决、多元筹资,以行政独立、村屯合并的方式,整合邻近的自强、奋斗两村,成立全县第一个村级社区,继而创新农牧经营方式,推动劳动力回流,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服务机制,为居民生活提供充足保障。匡垚瑶、杨庆媛等^[11]以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为切入点,利用转移矩阵法探究重庆市渝北区古镇路的土地利用情况,从地形条件、生态环境、居民点规模和区位条件等四个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城镇转化型、村庄重点扩展型、村庄挖潜型、村庄合并型、迁移型等五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

通过研究我国各个地区合村并居建设的相关案例和文献,可以发现他们大多基于某个具体地区局部展开,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并且是对已经实现合村并居建设的地区进行分析,鲜少有人探索未进行村庄合并地区与合村并居建设的匹配性。为弥补这个不足,本文从整体入手,利用熵值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建立一整套合村并居建设评价体系,以期为不同地区提供适合当地发展状况的合村并居发

展模式,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建设的多样化。

三、基于居民体验的合村并居建设影响指标

(一)居民体验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尚未对居民体验的定义达成一致,研究更多的还是用户体验理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村民既是农村的主人,也是农村发展的拥护者,同时还是合村并居建设的直接影响人和受益人,因此,合村并居过程中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居民的体验感和幸福感。Marc Hassenzahl 和 Noam Tractinsky^[12]认为,用户体验是用户内在倾向、需求、动机等与系统外在的目的、功能等,在特定的交互环境下产生的结果;O'Brien Heather L.和 Toms Elaine G.^[13]认为,用户体验主要由感知可用性、美学、注意力集中、感觉参与、新颖性和持久性等六个方面组成;李堂军^[14]等认为,居民体验只是居民对其所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是一种心理感受。

由此,可以认为合村并居过程中居民体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表现在现实体验上,即并居后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空气质量显著提高,村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让村民出行更加便利,基础娱乐设施的健全让村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让村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缓解;另一方面表现在心理认可上,即居民认可并居后的改变,并对村庄发生的改变感到幸福和满足,真正从内心支持乡村并居建设。

(二)合村并居建设的影响指标

本文以居民体验为切入点,探讨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评估模型的构建,在指标的选取上就应该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构建农民幸福指数函数^[15]来进行合村并居建设发展模式评估模型的数学分析,并参考已有的城镇化发展建设体系^[16-21]以及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指标研究,确定经济发展、人口因素、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为一级指标。

1. 经济发展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收入水平一直被视为影响个体效用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22]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地区进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没有一定的产业经济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就无法推进。在参考之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收入、^[17]农业产值和村庄建设投入作为衡量影响合村并居建设的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农民用于日常消费和储蓄的金额总和,是农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地方财政收入是由国家政府依据相关政策征收的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各种税收在内的合法收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政府进行相关经济建设的力度和范围;农村大多以农业种植作为经济收入来源,农业产值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农村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成果,由此可以判断该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情况;村庄建设投入包括房屋建设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入,能够直观反映中央和地方对农村建设投入的力度。

2. 人口密度

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23]无论是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农作物的种植和土地开发,农民都是最直接的行动者和受益者。但是,自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众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空心村”现象频频出现。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图 1),城镇人口数量在 2011 年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数量,农村人口的流失既无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又造成大量耕地资源闲置,土地资源浪费严重,阻碍了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在参考何刚、^[16]1960 杨浩、^[19]20 白永平^[20]122 等人文献的基础上,依据张彤进、万广华在研究中提到的房产数量越多越幸福,^[24]而且住房条件越好,农户更容易感觉到幸福,^[25]因此,可以选取农业人口、自然村数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农村人口密度变动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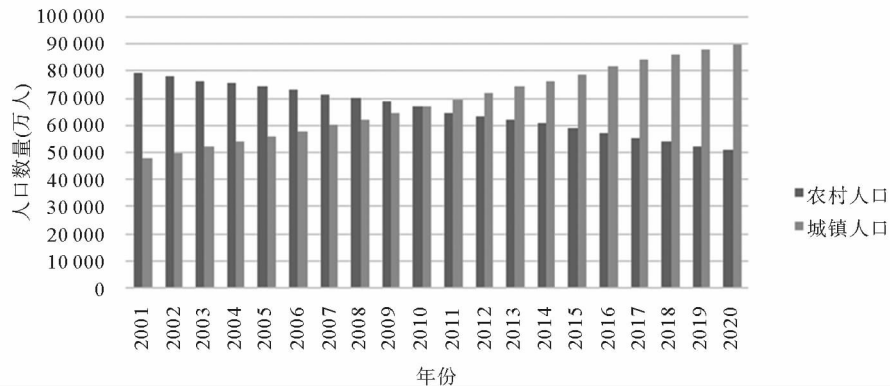


图1 2001—2020年中国城乡人口变化图

3. 社会公共服务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依和劳有所得,是广大人民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6]因此,公共服务对贫困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大^[27]。合村并居政策的推行要真正从居民体验的角度去探索适合不同地区发展的模式,注重农民的幸福感受,因此,选取医疗卫生支出、^[16]¹⁹⁶⁰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⁶ 教育支出^[18]⁸² 三个与农民幸福感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指标。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健康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8]健全的医疗卫生制度能够尽量减少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样,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依、劳有所得;而“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相关数据表明,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就越高^[29]。

4. 生态环境

环境满意度越低,个体越不幸福,尤其是因为农村的工业垃圾而造成的环境污染^[30]。环境污染不仅严重破坏农村生态系统的平衡,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受,^[31]妨碍生态宜居城市的建立。在参考何刚、^[16]¹⁹⁶⁰ 黄冬梅、^[17]⁶ 胡元瑞、^[18]⁸² 白永平^[20]¹²⁴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废水排放量、绿化覆盖面积、环境卫生投入等因素作为衡量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废水排放量主要包括工业、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水等的排放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污染程度最直接的指标;绿化覆盖面积是有效衡量乡村地区环保意识高低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考核中国城市环境保护力度和检验文明城市建设程度的重要指标;环境卫生投入可以反映该地区政府对环境卫生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力度,较高的环境卫生投入可以有效帮助农村摆脱“脏、乱、差”标签,促进环境友好型绿色乡村的建设。

四、模式构建与标准选择

(一) 发展模式评估模型构建

根据合村并居建设影响因素,可以建立某一地区合村并居建设发展模式评估模型,即:

$$C = \sum_{i=1}^n \sum_{j=1}^m \sum_{k=1}^s \sum_{l=1}^t a_i E_i + b_j P_j + c_k S_k + d_l G_l, \quad (1)$$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k = 1, 2, \dots, s; l = 1, 2, \dots, t,$$

其中, C 表示一个地区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质量综合指数,且 $C \in (0, 1)$,当 $C \in (0, 0.5)$ 时,表明该地区不具备进行合村并居建设的条件,在乡村社区建设中应该维持原状;当 $C \in [0.5, 1)$ 时,表明该地区已经具备进行合村并居建设的条件,可以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有特色的合村并居建设。 E_i , P_j , S_k , G_l 分别代表影响合村并居建设的各项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指标, a_i , b_j , c_k , d_l 则分别为

各个相对应指标的权重系数。

综合多篇参考文献,将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农业产值和村庄建设投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记为 E_1, E_2, E_3, E_4 , 其中 a_1, a_2, a_3, a_4 作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则影响合村并居建设的经济发展指标的综合指数方程可以记为:

$$\sum_{i=1}^n a_i E_i = a_1 \frac{\log_{10}(E_1)}{\log_{10}(Max)} + a_2 \frac{\log_{10}(E_2)}{\log_{10}(Max)} + a_3 \frac{\log_{10}(E_3)}{\log_{10}(Max)} + a_4 \frac{\log_{10}(E_4)}{\log_{10}(Max)}, \quad (2)$$

$$Max = \max\{E_1, E_2, E_3, E_4, P_1, P_2, P_3, S_1, S_2, S_3, G_1, G_2, G_3\}。 \quad (3)$$

将农业人口、自然村数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三个指标,分别记为 P_1, P_2, P_3 , 则指标方程为:

$$\sum_{j=1}^m b_j P_j = b_1 \frac{\log_{10}(P_1)}{\log_{10}(Max)} + b_2 \frac{\log_{10}(P_2)}{\log_{10}(Max)} + b_3 \frac{\log_{10}(P_3)}{\log_{10}(Max)}, \quad (4)$$

其中 b_1, b_2, b_3 分别作为衡量人口密度的三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将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教育支出作为衡量社会公共服务的三个指标,分别记为 S_1, S_2, S_3 , 则指标方程为:

$$\sum_{k=1}^s c_k S_k = c_1 \frac{\log_{10}(S_1)}{\log_{10}(Max)} + c_2 \frac{\log_{10}(S_2)}{\log_{10}(Max)} + c_3 \frac{\log_{10}(S_3)}{\log_{10}(Max)}, \quad (5)$$

其中 c_1, c_2, c_3 分别作为衡量社会公共服务的三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将废水排放量、绿化覆盖面积、环境卫生投入作为衡量生态环境的三个指标,分别记为 G_1, G_2, G_3 , 则指标方程为:

$$\sum_{l=1}^t d_l G_l = d_1 \frac{\log_{10}(G_1)}{\log_{10}(Max)} + d_2 \frac{\log_{10}(G_2)}{\log_{10}(Max)} + d_3 \frac{\log_{10}(G_3)}{\log_{10}(Max)}, \quad (6)$$

其中 d_1, d_2, d_3 分别作为衡量生态环境的三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二)权重确定

熵值法是指根据各个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32]即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就越大,同样地,信息量越大,它的稳定性也就越强,熵也就越小。

假设选取 n 个年份作为样本,设计 m 个综合评价指标,则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text{正向指标:} \quad X_{ij} = \frac{x_{ij} - x_{i \min}}{x_{i \max} - x_{i \min}}, \quad (7)$$

$$\text{负向指标:} \quad X_{ij} = \frac{x_{i \max} - x_{ij}}{x_{i \max} - x_{i \min}}, \quad (8)$$

其中: x_{ij} 表示指标原始数据, X_{ij} 表示第 i 年的第 j 个评价指标值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X_{i \max}$ 表示第 i 项指标在各年份中的最大值, $X_{i \min}$ 表示第 i 项指标在各年份中的最小值。

2.计算各项指标数据 X_{ij} 的信息熵

$$e_j = -\frac{1}{\ln n} \sum_{i=1}^n (p_{ij} \ln p_{ij}), \quad 0 \leq e_j \leq 1, \quad (9)$$

其中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如果 $p_{ij} = 0$, 则定义 $\lim p_{ij} (p_{ij} \ln p_{ij}) = 0$ 。

3.计算差异性系数

$$g_i = 1 - e_i。 \quad (10)$$

4. 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

$$w_j = \frac{g_j}{\sum_{j=1}^m g_j}, j = 1, 2, 3, \dots, m. \quad (11)$$

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可以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 1 所示,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 年山东省统计年鉴》、中国知网、国家统计局、2008—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 2008—2019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有关数据。

(三) 空间相关性确定

合村并居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个村庄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由此判断它们更适合何种乡村发展布局,并对此因势利导,建设属于当地特色的发展模式。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指利用空间分析来研究各个事物在空间上的相关性,^{[20]123}注重研究变量在整体分布空间上的相关性和集聚性,以系数 $Moran's I$ 作为测度全局的自相关统计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frac{n \sum_{i=1}^n \sum_{j=1}^m w_{ij} (Y_i - \bar{Y})(Y_j - \bar{Y})}{(\sum_{i=1}^n \sum_{j=1}^m w_{ij}) \sum_{i=1}^n (Y_i - \bar{Y})^2}, \quad (12)$$

其中, n 为搜集到的数据中年份的总数, m 为综合评价指标的总数, Y_i 表示第 i 个年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bar{Y} 表示平均值;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中的元素。本文以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为依据, $Moran's I$ 的取值在 $[-1, 1]$ 之间,当 $Moran's I > 0$ 时,表示正相关,且 $Moran's I$ 越接近于 1,说明正相关越强;当 $Moran's I < 0$ 时,表示负相关,且 $Moran's I$ 越接近于 -1,说明负相关越强;而当 $Moran's I$ 接近于 0 时,说明两者之间在空间上不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说,当某个地区的 $Moran's I > 0$ 时,说明该地区在空间上适合聚居类的发展模式;而当 $Moran's I < 0$ 时,说明此地区不适合聚居类的发展模式,更适合分散式的发展模式。

五、合村并居建设模式的划分

中国乡村各具特色,分布错综复杂,很多传统村落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受自然农耕劳作影响所形成的,或是依山而建,或是傍水而生,因此,各地的合村并居建设也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根据本文建立的合村并居建设发展模式评估模型,可以将我国农村地区的合村并居建设分为零社区发展模式、旧村升级分散发展模式以及乡村聚居大社区发展模式。

(一) 零社区发展模式

当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C \in (0, 0.5)$ 时,说明该地区在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社会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指数不高,并不具备进行合村并居建设的条件。农村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又循

表 1 合村并居发展建设发展模式评估模型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权重%
经济发展 E_i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E_1	元	9.40
	地方财政收入 E_2	亿元	8.43
	农业产值 E_3	百万元	5.93
	村庄建设投入 E_4	万元	4.22
人口密度 P_i	农业人口 P_1	万人	7.97
	自然村数量 P_2	个	4.64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P_3	平方米	10.17
社会公共服务 S_k	教育支出 S_1	亿元	8.6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S_2	亿元	6.54
	医疗卫生支出 S_3	亿元	9.77
生态环境 G_i	废水排放量 G_1	万吨	7.84
	绿化覆盖面积 G_2	公顷	5.93
	环境卫生投入 G_3	万元	10.53

序渐进的过程,在产权方面包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宅基地“三权分置”等;在经济方面包括房地产开发、道路改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在生态环境方面包括农村污水治理、农村改厕。在条件未成熟之前,盲目地进行合村并居建设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更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现有的乡村振兴建设成果。因此,对这些地区来说,应该采取零社区模式,在不破坏农民现有的生活条件下,加大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开发当地特色资源,深挖乡村发展潜力,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村农业改革稳步推进、农村脱贫建设有效进行,打牢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二)旧村升级分散发展模式

当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C \in [0.5, 1)$ 时,说明该地区已经具备了进行合村并居建设的综合条件,但是 $Moran's I < 0$ 时,又说明这些村庄在空间上的联系是负相关的,即此类地区并不适合聚居类的发展模式,更适合分散式发展,也即旧村升级分散发展模式。该模式要求相关联的村庄在不改变原有村落地理方位的基础上,由政府或企业出资对原先的村庄进行改造,创建农村电商平台,加快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加大对农村道路、卫生所、小型超市、网络维修、文化娱乐、垃圾处理、厕所等场所的建设投入;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农村基础设施,为村民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生活环境。同时,在行政管理上,由各村选举村民代表组成新的领导班子,由原先的“各自为政”转变为集中领导,依据国家政府有关政策实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具体的村民生活琐事处理上,由各村负责人在不损害村民意愿和利益的前提下,依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以山东省临朐县东城街道北石庙中心村为例,其由北石庙村、曹家旺村、蔡家董庄村、吕家河村4个村庄合并形成,在行政区划上,4个村的地理位置不变,村民无需进行易地搬迁,生活环境并未发生改变;但在政治工作上,撤销原先的4个行政村党支部,由4个村的村民重新进行选举,产生新的中心村党总支和负责人,实行经济单独核算,政治、政府工作由中心村统一安排。

(三)乡村聚居大社区发展模式

对于合村并居建设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C \in [0.5, 1)$,且 $Moran's I > 0$ 的地区来说,这些地区不仅具备了合村并居建设的综合条件,而且各个村庄在空间联系上正相关,说明聚居集合的发展模式更利于加快该地区的乡村振兴建设。乡村聚居大社区发展模式要求村民搬离原先生活的村庄,集中居住在新修建的大社区中,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行政管理上,摒弃原先的村庄治理模式,由社区居民重新选举负责人,组成新的社区领导班子,成立新的党支部和居民委员会,实现空间和行政上的双重集中管理。以山东省临朐县皇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皇山社区建筑总面积达27万多平方米,其中,多层安置楼26幢,高层12幢,安置农户1420户,同时建有配套的多功能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管理和医疗教育工作安排到位,小区绿化达标。在社区人员构成上,该社区目前由赵家庄、尹家沟、善家庵村三村合并形成,并且3个村的村民按要求搬离原先生活的村庄,集中居住在新修建的皇山社区;在社区政治事务上,由村民重新选举社区领导班子管理社区事务、促进社区发展,但在某些具体事务比如说村规民约等方面,仍旧由原先的村庄负责制定管理。

对于村民异地搬迁居住而闲置的土地,根据各个地区在经济、人口、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分别实行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乡村经济主导发展模式、人才吸引保持发展模式、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发展模式、现代乡村健康环保发展模式。

1. 乡村经济主导发展模式

对于某些因地理位置偏僻、地势崎岖、土质条件差、缺乏支柱性产业经济,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全省的农村地区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将农民幸福感落到实处。乡村经济主导发展模式提倡将搬迁后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建立大型工业园。一方面,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外地优秀企业,弥补当地部分经济发展领域的空白,为当地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加大政府财政拨款,大力扶持当地特色工农业、服务业经济,增加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交通设施建设,

为当地经济发展铺路造桥,防止本土资源流失。不仅如此,当地政府还应该有序推出利于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降低土地租赁价格,增加政府补贴投入,降低企业纳税金额,加强对企业优秀人才的奖励等,适当放宽企业发展条件,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为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 人才吸引保持发展模式

对于青年人口密度过低、乡村老龄化严重的“空心村”地区来讲,其首要任务是创造条件吸引青年人口返乡。人才吸引保持发展模式是基于乡村少儿和老龄人口过多、青壮年发展动力不足提出的,该模式一方面承接乡村经济主导模式,以大力发展经济为前提,鼓励乡镇企业建设,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更多本地就业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另一方面提倡政府出台更多的人才激励发展政策,吸引外地的优秀人才来此工作。比如,在市场平均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高学历、高技术人员的工资、住房补贴及福利待遇,推动农村社区领导管理队伍年轻化,拓宽年轻人才的晋升渠道,授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扩大他们施展拳脚的空间,为当地留住人才、发展人才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3. 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发展模式

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发展模式针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但是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地区展开。该模式提倡农村大社区建设完成之后,由政府出面,增加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并拉拢当地优秀企业投资教育建设,修建幼儿园、小学等基础教育场所,提高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改善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条件,加大对医疗器械的财政投入力度,降低农村药品价格,提高医护人员工资待遇,留住优秀的乡村医生;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完善农村医疗报销制度,提高农村65周岁以上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准,建设老年活动中心和农村疗养院。

而对于某些偏远地区来说,导致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过低,又没有足够留住人才的福利政策。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采取乡村经济主导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打好经济基石,其次是采取人才吸引保持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优秀教育、医护和基层工作者并留住他们,最后是采取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发展模式,由政府出面,并借助社会优秀企业的资金力量,增加对农村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切实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准及医疗卫生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就业完善制度。

4. 现代乡村健康环保发展模式

某些农村地区因为大力发展养殖业、化工产业等支柱性产业,造成当地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针对此类地区,应该倡导现代乡村健康环保发展模式。该模式强调在农村社区建设完成之后,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环境的治理和对工业污染严重企业的管控力度,出台相应的污染治理条例,针对不同程度的污染事件采取不同力度的惩罚措施,以相关政府条例约束企业管理者和乡村村民的污染行为;政府还应当引导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和旧动能转化,引进先进的“三废”污染处理技术,减少企业污染。对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而言,应该加强对农村环保知识的宣传,严格规划畜禽粪便处理流程,减少粪便污染;建立农村社区垃圾处理点,安排专人负责农村生活垃圾的清理外运;完善小区绿化工作,增加绿化面积,净化空气质量;减少或杜绝农村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行为,减少空气污染;清理社区道路两旁的杂物堆积,改善社区面貌,提升社区形象,促使基层工作人员以实际行动为新社区的居民创造宽敞、干净、绿色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 [1]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2):57-62.
- [2]武中哲.市场与行政:合村并居重构乡村秩序的两种形式——基于山东省诸城市的调查[J].理论学刊,2020(2):135-143.
- [3]唐皇凤,冷笑非.村庄合并的政治、社会后果分析:以湖南省AH县为研究个案[J].社会主义研究,2010(6):91-96.
- [4]陆昇.后“并村”时代乡村共同体的重构——以浙江省兰溪市村庄合并实践为例[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2).
- [5]周子航,张京祥,陈江畅.“说服性治理”:基于沟通行动理论的乡村治理逻辑阐释——以山东省合村并居事件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1):45-52.

- [6]党国英.不可盲目推行“大村庄制”[J].村委主任,2009(12):11.
- [7]尹雷,王思贤.村庄合并与村改居社区建设:“大村庄制”与乡村城镇化内动力的社会学阐释——基于山东省三义口社区的调查[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5):15-25.
- [8]刘富刚,刘连兴.农村合村并居中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以德州市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4):320-323.
- [9]张秀吉.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利益多元与治理——以齐河县农村合村并居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11(2):86-90.
- [10]李春风.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的实践与启示——以依安县丰林村为例[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9-51.
- [11]匡焱瑶,杨庆媛,王兆林,等.低山丘陵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J].山地学报,2017(3):399-411.
- [12]HASSENZAH M, TRACTINSKY N. User experience-a research agenda[J]. Behaviou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6(2):91-97.
- [13]O'BRIEN H L, TOMS E G.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survey to measure user engagemen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1):50-69.
- [14]李堂军,张琪.基于居民体验视角的新时代特色小镇建设模式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6-95.
- [15]李飞,唐丽霞,于乐荣,等.农户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0个村庄的横截面数据[J].西北人口,2013(1):41-46.
- [16]何刚,杨静雯,鲍珂宇,等.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及其效应分析[J].安全与环境学报,2020(5).
- [17]黄冬梅,刘小玉,郑庆昌,等.多中心格局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两大都市区为例[J].生态学报,2020(21).
- [18]胡元瑞,田成志,吕萍.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空耦合效应机理与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0(9).
- [19]杨浩,吴才武,周思言,等.京津冀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9).
- [20]张文娟,白永平,车磊,等.基于TOPSIS模型与多维结构的中國城镇化质量空间分异及影响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20(5).
- [21]卓德雄,曾献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及测度——基于Topsis改进的因子分析模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2):221-229.
- [22]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4):72-80.
- [23]陈秋红.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责任主体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8(6):88-95.
- [24]张彬进,万广华.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J].江苏社会科学,2020(3):111-120.
- [25]武壮,张士云.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9-52.
- [26]廖福崇.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幸福感: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J].兰州学刊,2020(5):136-150.
- [27]郭铖.贫困农民经济地位、社会互动与幸福感——以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2):153-159.
- [28]JIANG S Q, LU M, SATO H. Identity,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0(6):1190-1200.
- [29]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管理世界,2011(8):11-22+187.
- [30]黄季焜,刘莹.农村环境污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全国百村的实证分析[J].管理学报,2010(11):1725-1729.
- [31]杨继东,章逸然.空气污染的定价:基于幸福感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4(12):162-188.
- [32]梁志霞,毕胜.基于城市功能的城市发展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J].经济问题,2020(1):103-111.

Research on the Village Amalgamation Modes in New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 Experience

LI Tangjun, YANG Lux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with the relevant data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as the sample, this paper,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ensity, social public servi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fines 13 indexes which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amalgamation construction in new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connected relationship among resident experience, resid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form of the villages, to build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malgamation modes and calculate the composite quality index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malga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propor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ensity, social public servi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act development mode does not work for all regions, which explains why we should avoid the “unified mode” at “the same spe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village amalgam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index and *Moran's I* coefficient, three village amalgamation construction modes are specified: the Mode of Zero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Mode of Old Village Upgrading and Decentralized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 of Large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opulation, public service and ecology, four sub-modes are further clarified: the Rural Economy-Led Sub-mode, the Talent Attracting Sub-mode, the Rural Public Service Construction Sub-mode, and the Modern Rural Health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mode, thus providing mor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amalgamation construction in new rural areas.

Key words: resident experience; village amalgamatio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communities;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责任编辑:魏 霄)